

走出与回归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逻辑

张 秀 琴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2)

摘要: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它的早期阶段和当代形态。由于受苏联 30 年代教科书体系的影响,走出苏联模式与回归马克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逻辑。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哲学教科书;苏联模式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1)05-0017-06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与演化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它的解释系统(或载体)——教科书体系得以完成和体现的。作为一种主流哲学意识形态,它折射着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也深受它所属历史时期的哲学文化背景的影响(在这些哲学文化背景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过程呈现出“走出”与“回归”的逻辑,即走出苏联模式的影响而力图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状态。

因为这是一个至今仍在持续的动态的演化过程,所以我们对它的把握就有一些理论上的困难。当然,困难更明显地表现于走出的艰难与回归的困惑。

一 走出苏联模式: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早期形态

早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主要指 20

世纪初期至中后期(大约 20—60 年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生长过程。这是一个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过程(所以我们称它为“早期形态”),同时也是走出苏联模式影响的过程(这是它演化的逻辑)。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是它的萌芽阶段。其特点是:通过知识分子的译介,管窥马克思主义之一斑,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部分内容。

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国人对十月革命胜利的羡慕立即上升为对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崇拜)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觉的人们有机会对各种新思潮进行自由讨论和比较鉴别)恰好为这种以译介为主导形式的传播方式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中国形态提供了生长点。

先觉先进的知识分子,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传播的主体,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介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提供了最直接的部分内容。这些知识分子有李大钊、毛泽东、李达、艾思奇等。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李大钊于 1919 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系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该文分十一个部分,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历史论、经济论和运动论),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首次较为完整的介绍。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①,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最早理解;他强调唯物史观是“拯救中国的救星”,反映了中国人欲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愿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也是 20 年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理解的集中代表和最高成就。

到了 30 年代,随着苏联哲学体系形成演化,苏联哲学家编写了哲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被李达、艾思奇等及时地翻译成中文。如 1932 年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了由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就是苏联早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要教科书,由掣洛柯夫等著,李达认为这本书是辩证唯物论的系统说明。1934 年,由苏联著名哲学家米丁等写的《辩证法唯物论》,1936 年就被艾思奇、郑易里合译成中文,以《新哲学大纲》为书名出版(北平国际文化出版社)。沈志远也翻译了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该书分上、下册分别由商务印书馆于 1936 年和 1938 年出版。1938 年,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将苏联模式哲学体系定于一尊的教科书也在中国出版了,博古是翻译者。

这些译介直接为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作了准备。有史料证明,毛泽东正是通过这些哲学教科书的译介来系统、集中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只是可贵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运用中国人所熟悉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论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这就是“两论”的诞生。1937 年,毛泽东还编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看法:

在书名(“辩证唯物论”)、编排(分章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上都与 30 年代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这些并没有屏蔽毛泽东对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索。在“两论”中,他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论述,已是在具体内容层面为哲学体系的建构准备着坚实的材料,这些实际上构成了后来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在萌芽阶段,具有标志性成就的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上海笔耕堂书店 1937 年出版),这是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大纲》以五大篇^②的内容,构成了一个不同于苏联学者理解的、整体性的体系:没有单独的论述唯物论、意识论和认识论,把它们分别放在“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中合并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一致的思想,表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的“一块整钢”思想。该书还专门列章节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历史哲学,在当时是首次(也先于苏联哲学家),这种体系编排方法沿用至今。

40—60 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时期。形成的标志是 1961 年由中央宣传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编写、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出版。译介的重点由苏联教科书转向马列原著,国人自己编写的教科书明显增多,体系内容编排中将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重要部分,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编排方法基本定型,是此时的体系演化特点。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成为主流哲学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进入了崭新阶段:专门成立的哲学科研机构(如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哲学笔记》等的陆续出版);各高校也陆续设立哲学专业,请苏联哲学专家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全国上下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

这就对哲学教科书产生了极大的需求。李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

论”解说),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等都是应时之作。

这些教科书(有的只是讲义)和当时一起出现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亚历山大洛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论》(1954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58年)一样,深受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影响,在编排上基本上按照板块结构体系,将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分开,论述内容由四大部分组成(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每一部分再另立章节单独论述原理和范畴,最后加上一些有限的事例,仿佛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③。

国内的教科书不同于苏联教科书的地方是:前者在组成体系的内容上,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三论——《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具体论述基本原理和范畴时,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和论述被补充进去,甚至有的章节的论述就直接按照三论的编写顺序进行。

在体系编排基本方法的苏联模式化和体系基本内容及部分章节的中国化(毛泽东化),如果说在李达编写《唯物辩证法大纲》、艾思奇编写《辩证唯物主义纲要》时还是发展的趋势,1961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主编),则将它规范化和定型化。它的出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中国版”正式诞生了。在此之前,尽管国内已出现一些哲学教科书,但都没法取代苏联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地位,现在,国产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最新理解和经典理解,以后的哲学教科书,尽管出现了几百种,但大都没能跳出它的套路。

可见,中国早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直处于走出苏联模式的努力中。

二 回归马克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形态

这种走出苏联模式的努力和探索,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回归马克思。如果说这一转变的实践契机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社会环境,那么其理论契机就是哲学体系改造的强烈呼声。

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不仅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使我们开阔了理论视野。打开窗户的某一天,我们发现,马克思不仅仅是苏联的,它还是法国的、意大利的、东欧的,甚至美国的,它是属于世界的,当然它更可以是中国的。于是我们想了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了解德国的马克思,想了解西方哲学,了解中国哲学……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希望搞清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我们对苏联模式的体系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和寻求本真的冲动,促使我们加快了走出的步伐,坚定了回归的信念。

首先是1981年、1983年,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肖前等主编)的出版,在具体内容为体系增加了不少新鲜的血液:添加了思维模拟等反映新事实的新论据,引用现代科学的新发现和新成果,根据这些新材料,提炼出新的哲学概念、哲学范畴。唯物辩证法部分的编排顺序改为按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的顺序^④;对立统一部分的论述,也改变过去艾思奇的按《矛盾论》体系的写法。提出了“研究新问题,概括新材料,做出新结论”的体系建构任务。

198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谢龙主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作为整体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全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展开对辩证法、自然观、历史观的统一论述,打破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的体系结构。

1985年、1987年出版的,由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册),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两大块学说;在内容上以实践为基础,从主观和客观的基本矛盾出发,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为基本线索,建构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结构。这就从内容和体系结构上完成了对苏联模式体系的否定。

在体系的内容和结构方面分别做一些改动,不是开始于80年代,但却只有在此时才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这一过程是和七八十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实践问题和主客体关系问

题的讨论联系在一起。它的集中表现就是 80 年代开展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的大讨论。

人们提出了建构新体系的各种设想,这些设想包括:具体内容方面的增减、编排方式上的改动、哲学基本问题(体系出发点)的确立、体系安排的方法论原则等。

所以,80 年代(尤其是前期),是一个体系讨论的年代,提出体系设想的年代。

到了 90 年代(包括 80 年代末期),人们对体系的质疑从逻辑结构和表达形式扩展到理论本身,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实现着 80 年代的梦想甚至更多。

有人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力图通过对马克思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经济学手稿系列等)的原文重读,找出真正的马克思。这是对五六十年代译介的怀疑和重新认识。

有人以史带论,或者将马克思置身于近代西方哲学的境界,彰显它的科学性;或者将马克思置于当代西方哲学的场域,论证它的现代性;或者在中西哲学文化史的比较中努力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理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拓宽。

有人从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拓展体系研究新领域(如发展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等)。

通过这些途径,人们期望能够“回归马克思”,即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要义。

这种“回归”,不仅要发现过去被屏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领会其实质,建构科学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

因为,只有这样的体系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才能够给我们的民族真正指出一条发展与强盛之路。在苏东巨变后的国际形势下,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从 80 年代的大胆设想,到 90 年代的理论实践,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构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体系。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

质特征,构建新的哲学体系,就必须把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条基本的线索和理论基石。这是一个越来越被认同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它就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一切旧哲学的本质特征。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实现根本变革的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对思维和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决而展开的一个严格的体系。

第四种观点认为,新哲学教科书体系应该以人为中心来安排,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任务。

针对每一种观点,又引发出一些不同的见解和认识^⑤。每一种都认为自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回归’式理解,即本质把握。

这些互相间异质的观点,共同为新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只是这个过程尚在继续之中。

三 评价与反思:艰难的走出与回归的困惑

走出苏联模式的影响与回归本真的马克思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演化的逻辑,我们也从中发现了“走出”步伐的艰难和“回归”探索中的困惑。

评价与反思之一:艰难的走出。

“走出”苏联模式,实际上开始于 20 世纪初期,换句话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之初(甚至萌芽阶段),我们就已意识到应将苏联模式这一随着十月革命舶来的“二手”哲学体系“改造”成“国产”的体系。但是,我们发现在整个的早期形态的体系演化过程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始终未能摆脱苏联 30 年代教科书的体系框架^⑥,李达和艾思奇的教科书都有过改变的尝试,却未触动根本。1961 年,第一本中国版教科书的诞生就是集中体现。

走出苏联模式之艰难,原因何在?

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接之而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当时任何一个地球人都无

法忽视和不为之感叹的,更何况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苏联的成就使得我们对它所信奉的体系,羡慕有余而甄别不足。此为步履艰难原因之一。

理论的突破需要大量、详尽的一手资料和思想资源,以及优秀的哲学工作者富有成效的理论活动,更要有社会政治的宽松学术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而这一切,似乎来得太迟。我们无法重新设定历史,此为“走出”之艰难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苏联模式的认识与评价失之公允,要么奉为圣明,勉强指出两句缺点,却也是听起来像优点;要么挥棒怒斥,认为一无是处,大泻“拆解”之气,可是自己又不能提出任何能取而代之的有说服力的建议;要么貌似公允,暗地里或做着“虔诚徒”的事,或做着“解构者”的事,终是没有宏幅巨著让人大开眼界;或是干脆将之“搁置”,另起炉灶,却也气候不大。

当然,尽管有如此阻力,如此艰难,我们还是迈出了步伐,所取得的成就已非同小可。我们有了自己的体系,尽管它还也许有着别人的影子,但它的内容却越来越中国化。在革命时期,它突出的表现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内容;在建设时期,它突出的表现为邓小平理论体系。最后,走出苏联模式,也绝不是完全抛弃它,而是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它,屏弃完全照搬照抄的做法,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走出了苏联模式。

评价与反思之二:回归的困惑。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其早期形态中所拥有的品质——苏联模式的框架结构和中国特色的具体内容,在当代形态中依然存在。现在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包括原理和马克思

主义哲学史)仍然是以此形态存在。这到底是旧瓶子装新药呢,还是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实质意义,实现了真正的回归马克思?^①——此乃困惑之一。

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出现的文本解读、以史带论、人学体系和实践唯物主义,固然提供了了解马克思本真状态的良好途径和理论阐释角度,但是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了解马克思本人呢,还是掌握马克思主义^②?——此乃困惑之二。

90年代中后期,人们大谈各种与实际密切相关的“问题”,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大有借“问题”搁置“体系”之嫌。同时兴起各类以问题为主的哲学研究新领域,如发展哲学等,它们真像有人说的那样,取代了体系的研究,代表了新时期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此乃困惑之三。

最后的困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可喜的是,近两年已经有人在揭开这些敏感的困惑之盖。针对第一种困惑,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编写哲学教科书的方法和原因;针对第二种困惑,学者们的回答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本人)哲学在总体上是科学的,但是它是发展的、开放的体系。至于对第三种困惑的回答则是多种多样的。

尽管对这些困惑的回答本身也是有待商讨的,但这所有的一切,皆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的总图景,它的内容的丰富性、探讨的深入与细致,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化、民族化、个性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构建任务一定能完成。

注释:

①《李大钊选集》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分别是: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

③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苏联模式或“传统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板块说”和“推广说”。它不仅对苏联也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至今踪迹可辨。

④即先讲质量互变,依次为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

⑤如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就引发了关于实践问题的不同见解: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等。

⑥即两大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四个部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该体系由斯大林1938年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定于一尊,以后苏联的教科书大都沿用此体系,它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化。

⑦前者只包括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学界用“马克思哲学”指称;后者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还包括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及其的后继者和学生的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 [1] 斯大林.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A]. 斯大林文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2] 李达. 唯物辩证法大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3] 艾思奇.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4] 肖前. 论实践的唯物主义对现行哲学体系改造的意义[J]. 天津社会科学,1988,(3).
- [5] 任俊明,安起民. 中国当代哲学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6] 邢贲思. 中国哲学 50 年[M].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 [7] 中国 1999 哲学发展报告[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Evolution Logic of Marxist Philosophy System in China

ZHANG Xiu-q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the People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Marxist philosophy spreads in China,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system in China experiences its early stage and present form. As it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Soviet textbook system of the 30's, its evolution logic is to get free from the Soviet pattern and return to Marxism.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system in China; philosophy textbook; Soviet pattern

[责任编辑:李大明]

● 简 讯

“海峡两岸纪念李白诞辰 130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川举行

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省李白研究会、台湾亚太财团综合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纪念李白诞辰 1300 周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川举行。

会议先后在江油、成都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社科院、四川省社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以及台湾屏东科大、台湾亚太综合研究院、台湾成功大学等海峡两岸数十所大学、科研机构。

四川副省长李达昌、四川省政协主席章玉钧、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介铭等领导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讲演。(万 成)